

08

*eft*

#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

Richard Wolin

主编 吴冠军 蓝江

左翼前沿思想译丛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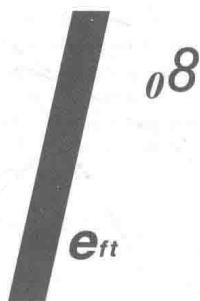
## 东风

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

[美]理查德·沃林-著 董树宝-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左翼前沿思想译丛08

# 东风

法国知识分子与  
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

[美]理查德·沃林-著 董树宝-译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

Richard Wolin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

by Richard Wolin

Copyright © 2010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s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遗产 / (美) 理查德·沃林著；

董树宝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3

书名原文：The wind from the East

ISBN 978-7-5117-3138-8

I. ①东… II. ①理… ②董…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法国

IV. ① D756.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2483 号

##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遗产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球

责任编辑：赵 灿

特约编辑：张少军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352 千字

印 张：16.75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谨以此书献给

2005—2008年在巴黎第十大学和南特大学听过我讲课的学生们!

## 总序

吴冠军、蓝江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我们经过漫长筹备的一套丛书：《左翼前沿思想译丛》。在汉语学界，“左翼（派）”这个说法长久以来陷于深度混淆：我们触目可见诸种“老左派”“新左派”“极左思潮”标签，但归在这些标签下的种种论述真的可以代表“左翼”吗？

什么是“左翼”？在我们看来，“左翼”有两个定义性的特征。一是态度性的，即对当下既有现状（status quo）持一个批判性的态度。这个“态度”（attitude），亦即福柯所说的“启蒙的态度”：“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历史时代的一个永恒的批判。”以此态度观之，今天汉语学界的许多“左翼”其实是名不副实的。

与此同时，“左翼”还有一个更实质性的特征：它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诉求”。这个实质性内核，就是争取更充分的平等。“左翼”的政治思想或话语，无论再如何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多元性，其最根本层面上的底色不会更改——追求一个更为平等主义的社会

(egalitarian society)。这就是“左翼”的两个定义性特征：批判性的态度与平等性的诉求。通过策划这套丛书，我们旨在在汉语学界重新厘清“左翼”思想的根本轮廓，并带领读者进入到左翼思想的最前沿地带。

以此为旨归，这套丛书将系统性地向汉语学界引入关于当代左翼思想的最前沿成果。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欧陆思想界的政治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状况与新的气象：在政治上，90 年代初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宣告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到来；而在哲学上，“后结构主义”将西方欧陆思想的发展推到了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极致，标识了“哲学的终结”。而恰恰是在这个双重“终结”的状况下，自 90 年代后期开始，一批卓越的欧陆思想家开始走到国际学术舞台之一线前台，其中具超凡影响力的就有齐泽克、巴迪欧、奈格里（及其合作者哈特）、阿甘本、拉克劳（及其合作者穆芙）、朗西埃、巴里巴、瓦蒂莫等等。这些思想家在过去近二十年间的著述，已然开辟出了欧陆思想的全新气象，打开了“后结构主义之后”的（诸种）新的开端。

## 二

如何在欧陆思想史脉络中定位这批新一代欧陆左翼领军人物？

让我们先回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前面已提到，当时，一股后来被概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运动，将欧陆思想的发展推向了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极致。为什么这样说？

古希腊的古典形而上学以“理性”（logos）应治多神时代的“神话”（mythos），以“自然”（physis）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基石。随后基督教神学以“上帝”代替“自然”，作为人的世界最终的根基与根据。欧陆思想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启蒙，则瓦解“上帝”的权威，重新以人的理性作为共同体之维系力量。继之而起的三轮思

想浪潮——历史主义、存在主义、阐释学——完成了从启蒙的普遍主义到后启蒙之视角主义（时代精神、个体意志、视域）的转换。随后兴起的结构主义，则借助语言学与精神分析而彻底瓦解“主体”之范畴（“主体”被构建论）。最后，在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这里，“历史化”与“结构化”相结合，“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无基础主义”“新实用主义”，皆指向了欧陆思想自身的逻辑终点——不再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力量或范畴，可以构成人类共同体的终极支撑。对欧陆思想史深有洞见的利奥·施特劳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便做出如下宣布：除了“回归”——回归古典形而上学或神学（“雅典或耶路撒冷”）——外，别无新的思想突破口。<sup>1</sup>

然而，我们已经能在晚近二十年欧陆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中，捕捉到一股新的思想脉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齐泽克与阿甘本这两位出生于 40 年代的思想家，与比他们略长半辈的奈格里、拉克劳、巴迪欧等人（皆出生于 30 年代）一起，围绕“the Political”（政治）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欧陆思想之前沿地带——一个新兴的“激进左翼”思想阵营。

但我们仍然面对的重要问题是：是什么使得这股“激进左翼”政治哲学在过去十几年内迅猛崛起？这些学者同前代左翼学者（后结构主义者）的根本学理分歧在哪里？他们是否真正打开了全新的思想格局？

### 三

在我们看来：这一代欧陆思想家的崛起，始于他们不满于后结

---

1 进一步阐述请参见吴冠军：《现时代的群学：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3—152页。

构主义者在“政治主体”问题上的立场——即“消解主体”后，拥抱微观政治、“私密的反抗”（intimate revolt）、拟像游戏、小叙事与歧见的繁荣、多元主义的族群认同，等等。在这些当代激进思想家看来，后结构主义的政治方案在今天已经彻底丧失反抗性，因为它们已经被整合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中：微观政治、“私密的反抗”、拟像游戏、小叙事繁荣、小共同体认同、开放的多元主义宽容等等，都能在被齐泽克称作“后现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中得到实现。而后结构主义的当代传人，如赛蒙·克里奇利、朱迪丝·巴特勒等人，皆发出如下论调：现状永远会持续下去，我们无法击败整个资本主义系统，我们只能进行日常生活中的“私密的反抗”，进而，努力让各种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声音被听到……这种左翼姿态，在当代激进左翼学者眼中，正是把左翼事业引向一条绝路：从哈贝马斯到克里斯蒂娃，顶级左翼思想家们明里暗里皆纷纷放弃社会变革的目标（承认资本主义秩序会不断持续下去）、放弃激进解放的理想（玩玩“私密的反抗”、搞搞小范围的游戏）……

是故，把理论进路并不一致的这批当代学者们联合成一个“激进左翼”思想阵营的，正是他们所分享的这样一种立场：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激进反抗。而在学理上，不论他们的正面主张为何，这批左翼学者旨在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的主体问题：传统的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之后，什么能成为新的变革既有秩序的主体？

今天“激进左翼”阵营中的成名人物，都在政治主体这个问题上深有建树。若对他们进行细致的理论梳理的话，则可分出四个理论路向。有意思的是，前三个路向正好两两出场：第一对，就是因写作《帝国》三部曲而大名鼎鼎的哈特和奈格里；第二对，是在 80 年代就已成名的拉克劳和穆芙（他们的成名作《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策略》，是左翼政治哲学的地震式作品）；第三对，就是齐泽克和巴迪欧（他们也有了一本合著，即收入本丛书的《当下的哲学》）。而第



四个路向，则是以阿甘本的《神圣人》（亦收入本丛书）三部曲为代表。这四个路向，实则构成了当代欧陆左翼思想之基本框架。

进一步沿着思想史的线索向上追索，我们就能看到以上四个路向各自背后的理论资源：第一对背后站着的是马克思和德勒兹，第二对背后是马克思和葛兰西，第三对背后是马克思和拉康，第四个背后则是海德格尔与本雅明。进而我们想指出的是，这批激进左翼思想家给我们打开的思想视野不仅仅是“回到马克思”，他们更是向上追到了古典德国理念主义（齐泽克），追到了斯宾诺莎（奈格里），追到了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阿甘本），追到了柏拉图（巴迪欧）。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把激进左翼的政治哲学，去放在一个更大的思想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对柏拉图到施特劳斯/巴迪欧、亚里士多德到阿伦特/麦金泰尔/阿甘本、霍布斯到施米特/阿甘本、斯宾诺莎到德勒兹/奈格里、康德到海德格尔/罗尔斯/拉克劳、黑格尔到科耶夫/泰勒/齐泽克等等这些充满“歧路”的思想史线索，去做出一个学理上的内在衡析。<sup>1</sup>

#### 四

汉语学界对当代左翼前沿思想的研究，从21世纪初大陆和台湾开始陆续翻译他们的著述以来，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至少在今天，齐泽克、奈格里、阿甘本、巴迪欧等名字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已经不再是陌生语词。

然而，其中很多著作之翻译质量，实是不如人意。究其缘由，我们认为问题出在汉语学界的研究者与翻译者们对当代左翼思想尚

1 以上分析的具体展开，请参见吴冠军：《第十一论纲：介入日常生活的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19页。

导读

## “东风”的法国之旅<sup>1</sup>

董树宝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错综复杂，两大阵营斗争激烈，呈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毛泽东洞若观火，写道：“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在理查德·沃林笔下，一股强劲的“东风”盘旋于巴黎的街头巷尾，掠过大学的教室饭堂，激发了青年学生的革命激情，造反的浪潮一波波接踵而至，最终演化为一场波澜壮阔的“五月风暴”。毛主义如星星之火一般焚野燎原，孕育了后五月时期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直接催生了持续影响当下的日常生活政治。

关于法国“五月风暴”的研究著作多如牛毛，既有当年参与者的回忆录与反思作品，也有当年旁观者的所见所闻，更有形形色色、视

---

1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ZDA194）阶段性成果之一，译者亦将本译著列入该项目。

角迥异的研究著作。如何从这些繁多的研究之中独辟新径，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这就是理查德·沃林在《东风》一书中努力要探寻的问题。《东风》之所以有别于其他著作而颇具新意，就在于它从众多研究者经常忽略的“毛主义”出发来重新打开那段鲜活的历史，重新描绘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

## 法国危机重重

“五月风暴”前夕，世界各地爆发了学生造反运动，革命幽灵一再重现，青年学生开始创造一种反映自身诉求的青年文化。当时法国虽处于“光辉三十年”的经济繁荣时期，但是法国社会危机重重，“革命”一触即发，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夏尔·戴高乐的“帝王式总统制”令人压抑、窒息，消费社会的来临令人无聊、平庸，大学扩招导致的就业压力，令青年人苦恼不堪。这些不同的要素相互激发、重叠，持续加剧法国的社会矛盾。

20 世纪 60 年代，戴高乐控制了法国政治局势。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和 1958 年军事政变的背景下重返法国政坛，终结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议会结构和政党分歧，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不过，总统制共和国逐渐蜕变为“帝王式总统制”，爱丽舍宫蜕变为旧式“王宫”。这种政治发展趋势与法国持续进行的现代化完全不同步，出现了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政治制度被认为处于第三共和国时期，而

法国到 20 世纪 60 年代已完全进入第五共和国时代”<sup>1</sup>，与此同时，60 年代法国处于“光辉三十年”的重要发展时期，出现了爆炸式的经济增长，法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超现代的后工业国家。法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阶级消失，工人阶级锐减，出现了一个以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公务员、教师和中层管理人员为主体的工薪阶级，这进一步瓦解了根深蒂固的代代因袭的社会文化观念，显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解释这一快速发展的社会问题。

“二战”后法国人口急剧增长，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有见识有教养的公民，他们开始寻求政治参与的新途径与可能性。前所未有的“光辉三十年”的经济繁荣使青年人、特别是来自中产阶层的青年人不再受制于物质条件的约束，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物质保障来接受教育，进行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他们开始寻求更加重视归属感、注重自我表达、追求生活质量的日常生活变革。大学的快速扩张虽然满足了更多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但大学的课程和管理没有及时进行调整，以便适应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课程内容枯燥乏味、令人窒息，与青年学生的政治文化诉求极为脱节，大学被讽刺为“贩卖知识的机器”和“文凭工厂”。与此同时，学生人数激增，造成学生宿舍过度拥挤，生活条件恶劣，而宿舍探视权的规定<sup>2</sup>与当时如火如荼的性革命格格不入，

---

1 引自本书第 28 页。

2 宿舍探视权规定是指，当时学校规定男同学晚上 11 点之后禁止进入女生宿舍，女同学只有到了 21 岁才可以探访男生宿舍，警察进驻校园，保证探视权规定的严格执行。

压抑了学生正当的情感欲求，一场力比多的革命即将爆发。

消费社会的来临促使企业想尽办法来推销商品，尤其是使用各种性意象的广告接踵而至，撩动着青年男女的深层欲望与情感需求，这无疑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持续深入的性革命。广告无处不在，时时传颂丰裕社会的赞歌，诱惑着消费者购买各种商品。让·波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描绘了现代消费主义的情欲本质：“广告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整个社会，真实或虚拟的购买力的永久海报……产品是以被观看、被操纵的方式呈现：它被情欲化了……加入了爱情游戏的所有成分：主动接近、竞争、亵渎、调情、卖淫（甚至是反讽的）。（已经存有一份原欲负荷的）购买机制，为一体整套情欲化的选择和花费所取代……而购物和消费的程序本身，便被如此地配上插图、打上灯光，玩弄和破解，就好像作为性交前戏的舞蹈一样。”<sup>1</sup>无处不在的广告，无处不在的“物”，充斥着整个世界，物的世界处于支配地位，而人变成了多余的附属物。法国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创作了《橡皮》《窥视者》等小说，揭示了主体性的丧失与“物的自主性增强”。消费社会最终绑架了日常生活，使人越来越平庸化、枯燥乏味、毫无意义，出现了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恶心”。面对消费社会的侵蚀，法国思想界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出现了一股“日常生活批判”思潮。虽然富裕丰足的社会给人提供了一系列的文化选择、职业选择、生活方式选择与消费

1 波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195页。

选择，让人貌似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然而消费社会的到来将人整合到社会权力运行机制之中，日常生活失去了自然性、非正式性，权力无孔不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受工人自治传统的启发，法国左派提倡一种“横向的”、平等主义的民主化模式。

### 毛主义者粉墨登场

3月22日运动是“五月风暴”的导火索，直接激发了一大批愤愤不平、此前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学生。当时新建的南泰尔校园处于大巴黎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周边是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和噪音喧天的工地，学习和生活条件很差，学生正当的诉求得不到认可和满足，曾爆发了一场关于宿舍探视权的抗议活动。1968年3月，巴黎爆发了一场反越战的重要集会，警方逮捕了6名学生，于是激进学生在科恩-邦迪的领导下举行抗议行动，这就是被后世不断提及的“3月22日运动”。因为政府和学校的拙劣行动，学生运动中心也从郊区的南泰尔校园转移到位于拉丁区中心的索邦大学。3月22日运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节点，个别的毛主义者参与并支持了这场运动，也在这一运动中锻炼了自己，为日后的社会政治运动奠定了基础。

5月3日至5月10日，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学生们自发地使用铺路石和碎石子建造街垒，出现了法国政治史上被不断赞颂的“街垒之夜”。作为反对警察权力的应对措施，街垒变成学生们领地的象征，更充当了一种与法国革命传统的象征性联系，仿佛学生们变成

了法国大革命时“无裤党员”和巴黎公社成员。<sup>1</sup> 这些学生恰恰是法国中产阶级的儿女，“街垒之夜”使他们接受了刻不容缓的政治教育，将他们变成一大批造反者。5月13日，法国工会和法国左翼天主教民主工会组织大罢工，声援并支持学生的抗议活动，由此形成一个工人与学生联合的反对戴高乐派的联盟，成为史无前例的新事件。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学生运动不同于其他各国学生运动的独特方面之一。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学生们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适度的、合理的政治诉求，从而使五月造反者变成一个“自我限制的革命”（self-limiting revolution）的经典案例。

此时此刻毛主义者在哪儿？他们在做什么？面对蓬勃发展的“五月风暴”，毛主义者于5月7日在巴黎高师举行集会，讨论毛主义者如何应对最新发生的政治事件。毛主义者自认为是“纯粹的”、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是革命的忠实信徒，不屑于与一群主要不满于宿舍探视权的中产阶级青年为伍，他们不认可这场正在发展的学生造反运动，反而鼓励支持者放弃拉丁区，建议支持者“现在到工厂去！”。作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负责人，罗贝尔·兰哈尔不分昼夜地工作，使他产生了某种政治妄想，错误估计了学生运动发展的形势。自称是革命先锋派的毛主义者有可能蜕变成革命后卫派，错失参与这场运动的最佳时机。

革命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学生与工人成立了工人与学生行动委员

---

1 引自本书第84页。

会，继续传播造反福音。未经批准的罢工浪潮接踵而至，促使工人萌发了独立自主的新意识。他们意识到，中产阶级尽管享受“光辉三十年”的丰硕成果，但是他们得到的报酬却低得可怜，而且他们还发现工会根本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开始考虑如何寻求工厂自治，占领工厂，实行自己管理工厂。战后法国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人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他们寻求更高的工资报酬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对革命不感兴趣。一旦工人阶级的要求被满足，他们就会离开街道，返回工厂。尽管如此，社会斗争的形式仍然发生了很大改变，开始解构社会控制的专制模式，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妇女、同性恋者、移民和囚犯），寻求社会民主文化。这些内容成为法国后五月时期的重要主题。

面对法国混乱的政治局面，戴高乐总统寻求应对策略。他获得了军方支持，于5月30日发表了电台讲话，力图整顿国家秩序。当晚，戴高乐主义者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游行，暂时扭转了政治局势，而政府与各工会之间签订的《格勒纳勒协议》也缓解了斗争的压力，巴黎暂时恢复了平静。看似戴高乐力挽狂澜，扭转了政治局势，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并没有解决那些酿成“五月风暴”的深层社会问题。1969年3月，法国举行公民投票，戴高乐落选，他这次永远归隐双教堂村了。

各派对“五月风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分析，致力于探寻“事件”的“解释”。来自右翼的雷蒙·阿隆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将这场造反运动描述为一出“心理剧”，暗示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心理上是失调的，需要进行治疗。而来自左翼的解释则认为“五月风暴”是



一个“突破口”，意味着学生们不再受制于政党、工会等传统政治形式，而是自发地寻求自己的平等主义。其中一种解释认为，“五月风暴”是一种全面消费社会的表达，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的变革，个人身份可以进行自由选择，不再受制于社会阶级预定的身份。纵观各种解释，理查德·沃林对“五月风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左翼批评者还是共和主义批评者，双方都误解了‘五月风暴’的政治特殊性。‘五月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它向传统的政治斗争形式提出了挑战，不管这些斗争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共和主义的。‘五月造反’符合一种新的、具有多种价值的政治动力，而这种动力早已超越阶级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学生和工人援引了开放性、公开性和直接民主的准则，以便反驳控制社会的新型专家治国论模式。由此，那些卷入五月抗议运动的人对统治的变更形态和当代社会作用的限制性本质具有敏锐的认识。”<sup>1</sup>

## 毛主义者的“革命时刻”

当法国社会 20 世纪 60 年代如火如荼地进行变革时，60 年代的共产主义中国又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观？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这是《东风》重点研究的议题之一。

众所周知，毛泽东于 1966 年 5 月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sup>1</sup> 引自本书第 107—108 页。